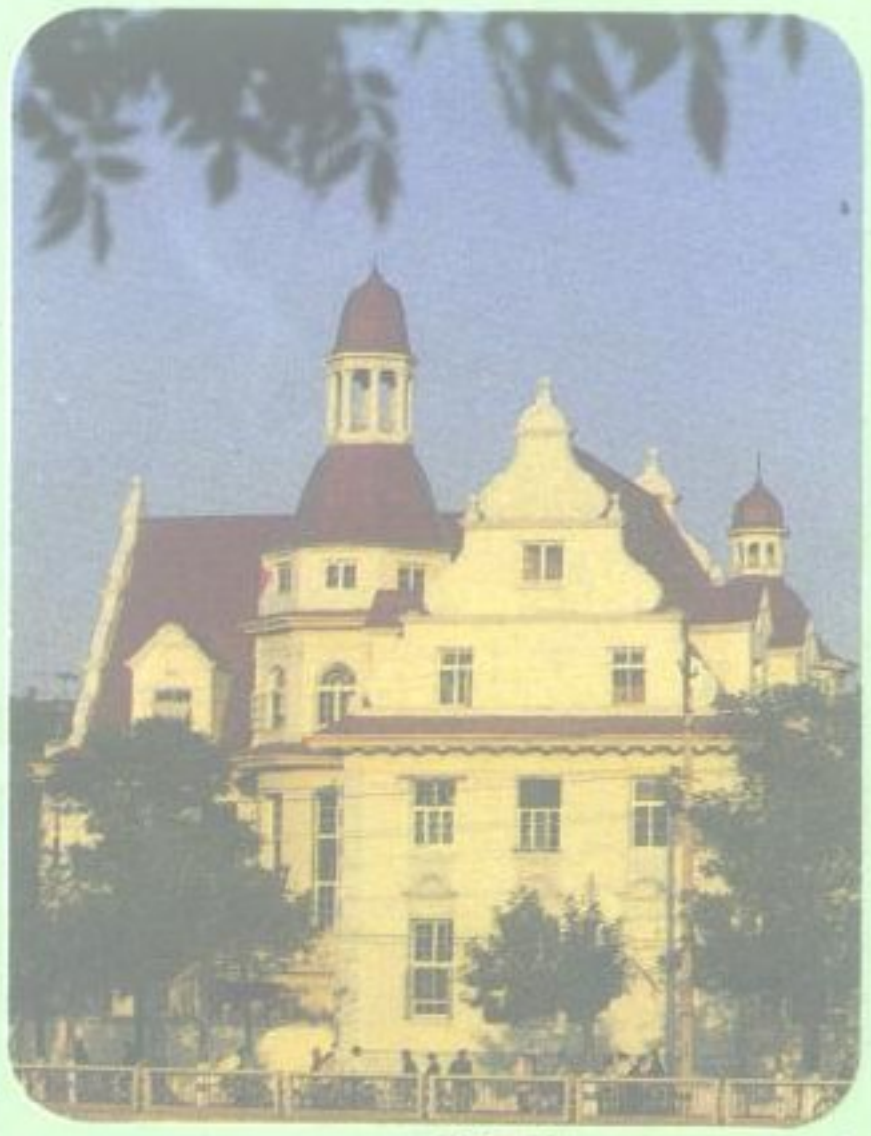
02

'94.1
（总第六十一辑）

要　目

● 一个妇女工作者走过的迹印
● 负笈求学记
● 祖父严修旧事数则
● 以经营粮钱业起家的“河东冯家”
● 我的学艺生涯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一九九四年第一期）（总第六十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津)新登字 001 号

执行编辑:张笑平
版面编辑:康　明
校　　对:张笑平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4·1(总第六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5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1—02133—8/G·988

定价:4.00 元

China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4·1(总第61辑)

一个妇女工作者走过的迹印 …… 罗慕班(1)
负笈求学记 …… 孙璧如(115)
我的父亲吴毓麟二三事 …… 吴淑芳(140)
为吉鸿昌将军看枪伤 …… 孙璧如(157)
旧中国民用航空概况 …… 吕耕人(44)

祖父严修旧事数则 …… 严仁赓(145)
会计学专家——李宝震 …… 冯桓墀(107)
爱国教育家罗光道事略 …… 秦　戈(159)
我所知道的石友三 …… 梁叔达(27)
袁世凯大千金袁伯祯…… 于培文　袁家宾(104)

China

EC30/18

商海话旧

天津“粮台冯家”…… 冯相文(46)
以经营粮钱业起家的“河东冯家” …… 冯桓墀(36)
记源记香油坊 …… 张英琦　张英瑞(172)
“耳朵眼炸糕”的来历 …… 刘恩起(138)

艺坛杂谈

我的学艺生涯…… 姜存瑞(62)
张紫垣与天津影剧业 …… 张世一(57)
漫谈西河大鼓…… 张剑平(129)

城隅浅话

浙江义园始末 …… 武书根　米秀沣(134)
天津鸟市及其他 …… 张先明(167)

China

天津黄家花园寻踪 …… 曹克鑫(100)

社会杂相

旧时天津的各类茶房 …… 刘炎臣(175)

史海掌周

褚玉璞的“大令” …… 赵恩贵(171)
西河大鼓马派名人——马增芬…… 姚惜云(133)
“吊钱儿”的传说…… 李志强(61)
坠子皇后——乔清秀 …… 姚惜云(137)
《星期六画报》的始末 …… 王　木(35)

封面照片说明 …… (15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一个妇女工作者走过的道路

罗慕班

编者按：罗慕班女士年轻时从事妇女工作，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在宋庆龄、吴菊芳、郭德洁等人身边工作过，参加过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妇女工作讨论会，并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结识了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其夫人以及著名妇女工作者。本文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侧面记述了第一、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妇女工作的情况，不失为一篇珍贵的史料。

我投身妇女工作的引路人——伍智梅[①]

我家与伍家是世交。伍智梅原籍广东台山，她的父亲伍汉持早年毕业于佛山西医学堂，曾在香港行医，1903 年创设英华学堂，1906 年创设图强医学堂，同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是孙先生的亲密战友，曾先后参加孙先生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及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又与党人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一度入狱。1911 年辛亥革命时，参加广东光复之役，任都督

---

① 伍智梅为国民党著名妇女工作领导人之一、社会活动家，1924 年国民党改组，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经孙中山先生提名，伍担任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第一任妇女部长。

——作者

府医务部长。中华民国成立后，当选众议院议员。1913年孙先生发动二次革命，伍在国会中反对袁世凯擅行善后大借款，并上书敦促袁退位，后在天津被袁世凯逮捕杀害，被当时时论称为“为国事流血第一议员”。伍智梅是伍汉持的长女，她和弟弟伯胜、伯良、伯就以革命烈士后裔，都得到照顾，各有成就。因此，伍智梅不仅同孙中山先生全家有通家之好，孙先生逝世时，参加治丧，奉安时参加执绋；而且同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及宋美龄都有相当过从，其中与宋庆龄最投契，平日交谈常操英语。国民党中的元老大都属于她的世伯、世叔之辈。我还记得当年在她的寝室床壁一面悬挂有居正亲书的一条“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大字横幅，寄以勖勉和期待。

广东台山是著名侨乡，侨居美国的人较多，伍智梅先在广州外国教会办的夏葛医科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深造，专攻妇产科，发表不少英文论著。回国后，并未从事医务工作，却一心一意投身于社会福利事业，最关心的却是妇女的疾苦，妇女的地位，妇女的职业，妇女的解放，决心从事妇女工作，愿为中国妇女做番事业。因此，首先联合当时的妇女名流和妇女团体组成“广东女界联合会”，出任主持人。为了便于工作，先后挂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委员及广州市党部委员，虽名为国民党人，从一贯的思想言行表现，既够不上左派，也谈不上右派，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完全靠父亲的余荫，只知一心从事妇女工作，热心社会事业，别的似乎都不感觉什么兴趣。多年来，由于她一心扑在妇女工作上，作出卓越贡献，赢得很高声望，社会上人多昵称伍为“梅姑”。

其间，伍智梅又一度前往美国，为设立其父伍汉持纪念医院募款，得到当地华侨、华人大力支持。募款归来，很快在广州东郊先烈路开工兴建，这座医院规模和设施在当年的广州都属第一流。因工程和装备需时，直到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军占领，尚未全部完成。抗战胜利后，又经过一番大力修缮，始开诊接纳病人。这是学医的伍智梅一生中为医学仅有的贡献。

从开始接触起，我和伍智梅之间就存在着亲切的关系，她对我来说是一位长者，我一直尊她为前辈和师友，她也以我为她的得力膀臂，始终对我给以信赖和倚重。多年来，就是这样积下一生深厚友谊。解放后，早年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的罗翼群由香港归来，一次由广东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与我夫妇相约在北京新侨饭店见面，告以伍智梅 1956 年 11 月在台湾病逝，我几伤恸难支。

我作为伍智梅的助手，通过她的社会关系，逐渐结识了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其夫人以及国民党著名妇女工作者，这给了我不少有利条件。记得其中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人，一位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一位是朱执信的夫人杨道仪。我和何香凝接触较多，香港《星岛日报》约我兼编该报《妇女周刊》，记得第一期何先生为我亲笔写了一篇号召全国妇女奋起救国的文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何先生适在香港，身陷险境。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及其夫人吴菊芳组织人员从事营救何先生脱险工作，我是被指定中的一人。我同杨道仪接触不多。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叛国投敌，她与汪以亲戚关系被拉下水，充任为日敌利用的广州执信中学校长，有侮先烈，负罪国家，令人痛惜。

自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伍智梅一直长住重庆，初时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继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仍孜孜不倦与沈慧莲、陈逸云、刘蘅静、黄翠凤、林苑文、罗衡、陶玄等（甚至把我也列名其中），在大后方举办妇女职业教育及妇女生产事业，都取得不少成就。每逢我到重庆，就见到她为此忙碌。有关妇女工作问题，宋美龄常向她征询意见，她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供参考。

抗日战争爆发时的广东妇女工作

1924 年 1 月，孙中山先生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国国民

党召开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问题同工人、农民问题一样，也受到重视，被提上议程。1924 年 1 月 31 日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通过国民党中央设立妇女部，领导全国妇女工作。并推选曾醒为部长，唐允恭为秘书。后曾醒辞职，以廖冰筠接替。未几，廖冰筠辞职。同年 8 月 14 日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改推何香凝代理部长，黎沛华为秘书，至 1926 年 1 月 22 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何香凝为部长，邓颖超为秘书。经过二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国共分裂，妇女部被取消。至二届五中全会，何香凝再次提出："应设指导妇女团体机关案"，该提案虽被通过，但未落实。仅先后在"训练部"设"妇女股"，"民众训练部"设"妇女科"。从此，国民党中央再没有领导全国妇女工作的机构。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认为国家存亡临到最后关头，全面抗战从此开始。宋美龄为配合抗战需要，先后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及"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并于各省市设立分会。当时广东省这两个分会都由伍智梅主其事，前者由雷励琼负责实际工作，后者由我负责实际工作。随着抗战局势日益扩大和激烈，为了做好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1938 年 5 月 20 日宋美龄邀请全国妇女界领袖及各界知名妇女代表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伍智梅是被邀者之一。被邀者中有共产党的邓颖超和孟庆树，二人联名作了《我们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及《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发言，赢得全场的赞赏。应邀者还有吴贻芳、雷洁琼、张霭真、唐国桢、沈慧莲、刘蘅静、沈兹九、刘清扬、李德全、刘王立明等。谈话会的主题是讨论战时妇女的任务，如何动员和发扬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优势，为抗战贡献力量。经过五天的讨论，制订出《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当时正值前方抗战紧张，为了应急，不容另设机构，决定将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改称"新生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全国妇女参加抗战的最高领导机构，并推宋美龄出任指导长，明确指出“该会宗旨是指导全国妇女从事全国抗战建国工作，并提倡善良风尚，改进民众生活，共负服务社会复兴民族责任”。同时决定各省市及各县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一律设立妇女工作委员会，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以各该地方首长夫人为主任委员。各省市和各县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各设委员若干人，其中由总干事一人负实际责任，总揽全部工作，其下分组办事。作出这些决定后，宋在闭幕词中，说明这次谈话会的重大意义以及对于抗战时期妇女工作的深远影响。

当时在妇女指导委员会之前冠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各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之前冠以各该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其实各省市或县市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在人事、编制、经费等方面均各自独立，与各该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互不相干。妇女指导委员会对各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并不通过各该地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对县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也是如此。因此，各省市或县市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对外则属独立单位，迳称各该地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当年外人望文生义，对这一实际情况多不清楚。

伍智梅从庐山回到广州，就着手组织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由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的夫人马凤岐出任主任委员，林苑文、邓不奴、黄翠凤、李秋蓉、雷励琼、郭顺清、李峙山、上官德贤和我为委员，伍智梅为委员兼总干事，为了适应前方浴血抗战的迫切需要，一经成立，就积极开展工作。此前成立的广东省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分会及广东省战时儿童保育分会，援妇女指导委员会成例，作为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直属的两个机构。

在此还应该说明一点，当“七七”事变爆发后，广东妇女激于爱

China

国抗敌的热情，有过一个自发的妇女组织即“广东省妇女抗敌同志会”，以李峙山为理事长，陈明淑为副理事长，同样为抗战贡献不少力量，直到广州沦陷，才自行解体。

抗战时期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广东省妇女工作先以区白霜（即解放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妇女工作者参与。至1937年11月间，我军弃守上海后，继有罗淑章为首的一批倾向进步的妇女工作者参与。伍智梅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全体工作人员说：“人各有信仰，我们要尊重她们，同为救国，并肩作战，我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亲密合作，不要受别有用心的人挑拨离间。”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至今记忆犹新。

一度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

1935年底，我从天津到达南京之初，就便去上海。在上海承伍智梅引见，拜识宋庆龄，当时我充满崇敬而又激动的心情。宋和我握手之后，便向我问长问短，坐谈之间，她给我的印象：雍容、端庄、诚挚，尤其是对我这个初次见面的女青年，亲切、热情，令人感奋，此情此景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

“七七”事变后，“八一三”事件相继爆发，上海成为战场。这时宋先生仍留在上海，奋起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发起募捐，不避危险，不辞辛劳，亲临战地慰劳。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发动国际舆论，争取国际援助。1937年11月上海退守，宋先生南下，在香港略作勾留，安置好住所，便到广州，并决定此后长住广州。在广州期间，因事有时也去香港住几天，直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前夕才移居香港。

宋先生于1926年11月离开广州，转瞬10年有余，这次到达广州，旧地重临，受到当地国民党领导层及各界群众热烈欢迎。由当时广州市长曾养甫陪同，伍智梅偕我随行，先后曾往看当年孙中

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时被陈炯明炮轰的总统府及居住的越秀楼旧址，总统府旧址已建成一座巍峨辉煌的“中山纪念堂”，越秀楼旧址矗立一座高达五米的“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宋先生抚今思昔，见景生情，似有无限感触。至黄花岗及其他革命先烈墓地凭吊，敬献花圈，默哀悼念。还携带大批鲜花和慰问品陆续至设在广州的各后方医院，慰问从抗日前线退下就医的伤病官兵，并至各个病床前亲切询问伤病医疗情况。现在各种书刊所登载当年宋先生在广州后方医院慰问伤病官兵的照片上，宋先生身旁就是伍智梅（解放后，有关方面不止一次前来问我这张照片，现在特写在这里）。此外，还参观了黄埔军校的旧址及各处的军事设施。

“八一三”以后，日本航空母舰开始驶向南海洋面，大批飞机不时起飞，以广州为主要目标，不分昼夜交替空袭，狂轰滥炸，断垣残壁，触目皆是，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宋先生为此向国际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对于日本如此穷凶极恶的野蛮暴行给予制裁。同时还特地亲自走访受难市民进行慰问，记得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发现一个从被日本飞机炸毙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宋先生抚抱良久，特别嘱咐医护人员要加意爱护。

宋先生的秘书廖梦醒，留在香港专为宋先生从事海外联络工作，后即主要负责宋先生发起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宋先生既决定在广州长住，因公私事务繁冗，感到身边仍需要一个秘书，因而与伍智梅商量，拟议要我摆脱其他一切职务，专任这项工作。首先是伍智梅将此事见告，并征询我的意见。当时我刚出校门不久，自知 学力菲薄，不敢受命。接着宋先生亲自和我谈话，鼓励我说：“我一再考虑过，认为你适当，如有疑难问题，可随时问我或请教伍先生。”情意拳拳，难再推却，我只好从命。

为避免市区的喧嚣和干扰，宋先生选择广州近郊河南岭南大学校园里一幢小楼为寓所，环境幽静，我也随进同住，一日三餐同宋先生两人共进。宋先生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餐后休息约半小

时，然后回到卧室套间办公室浏览中英文报纸，接着是批阅文件和函电；午餐后休息约一小时，然后看书或阅批文件和函电，会客多在下午的时间。我每日除代宋先生处理交办的文件外，会客时，如宋先生认为无须亲自接见的，便着我代为接见，向她汇报请示，至于各方面联络事宜，就完全由我承担。我和宋先生同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岭南大学一位魏教授（现忘其名），为宋先生和我在岭南校园住所拍下几张合影照片，可惜都未保存下来。

好看书是宋先生的习惯，尤其爱看中外历史书籍，她的办公室和寝室都有书橱，书橱里多属这类书籍，因此她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才学非常渊博，在闲谈时常以历史故事予人以启迪。

宋先生的国际交往很广，国际友人很多，每天都有从国外及香港寄来的信件。这类信件的答复多由她亲自用打字机打出，签署后交我发出。

宋先生到广州后，便继续投身抗战工作，无论对国内还是对国际都起到极为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留下磨灭不了的历史功勋，这是我当年在她身边亲历亲见亲闻所得，也为众所周知，在此无需多叙详述，现在仅就我在她身边这一段期间，还能想起她的一系列活动择要略记一二。

1937 年 12 月宋先生到达广州之初，便召集广州各华侨团体代表成立“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并亲任名誉主席。海外华侨一向对宋先生具有崇高的敬仰，在她的感召下，各国华侨群起响应，纷纷组织救国团体，争取为祖国抗战作出贡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仅捐输大量财物支援祖国抗战，而且许多青年回来参加祖国抗战。1938 年 3 月宋先生又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勉励海外华侨再接再厉，为祖国抗战作出更大的贡献。同年 9 月“华侨抗战动员总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来自海外各国各地的华侨救国团体代表齐集一堂，宋先生特由广州亲往参加，发表《华侨总动员》讲话，除对一年来的工作给以肯定外，还指出海外各

国及各地华侨救国团体最主要做好两项工作：加强团结，发扬民主，这样才可以提高侨胞救国热情，进一步给祖国抗战增强后劲。

1938 年 2 月间，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召开援华特别会议，宋先生以时间紧迫不及赶往参加，特委托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代表出席，并电顾她对此次会议所坚持的原则，从而争取到会议通过谴责日本、声援中国的八项决议。

同年 3 月“国际三八妇女节”，宋先生发表《向世界妇女申诉》一文，主要是向世界各国妇女，特别是欧美各国妇女说明不要以为现在自己身边没有面临战争，谁能保证明天战争不会降到自己身边。从而发出呼吁，要求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保障世界和平。

宋先生感到，要争取国际间更多的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就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组织从事这项工作。经过酝酿，同年 6 月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所联络的发起人不问政治党派，不问宗教信仰，不问所属国籍，诸如宋子文、孙科、何香凝、颜惠庆、廖承志、冯玉祥及贾士·尼赫鲁、保罗·罗伯逊、托马士·马等。当月 14 日宣告成立，发表成立宣言，“保卫中国同盟”总部设在香港。宋先生认为香港与世界各地容易联系，便于取得各种国际援助，而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电话随时可以通话。“保卫中国同盟”由宋先生担任主席，廖承志为秘书长，廖梦醒为秘书兼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有邓文钊、王文娜、耿丽淑、徐舜英、希乐达·沙乐文·克拉克、诺曼·法朗士、路易·艾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此外还有不少人以成员名义参加，如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柳无垢、陈斡生、吴大琨、陈乙明、许乃波等。“保卫中国同盟”为祖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宋先生也确为此费尽心血，用尽精力。我没有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只是宋先生在广州这一段期间，“保卫中国同盟”香港总部送来的报告及其他请宋先生批示的文件，都经我呈转，因此得知当时一些情况。后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及重庆不断发展扩大，但那时我已离开宋先生身边了。

此外，我还记得，宋先生在广州时，除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外，当时对由路易·艾黎发起联合中外人士共同为中国抗战效力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从酝酿筹办到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的确始终给以“百分之百地支持”。这是我当时从宋先生来往的函件及亲历亲见亲闻的感受中留下的记忆。

1938年7月“七七”事变一周年来临，宋先生特撰《抗战的一周年》一文，首先向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致以哀悼并向前线将士及爱国同胞致以敬礼，同时总结一年来血战的经验，指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正确前程，并对国民党当局在抗战问题上寄以期勉，给以批评。与此同时，她又以个人的名义向广东各界妇女发出号召，要求节衣缩食，踊跃献金，争取为抗战作出贡献。宋先生在广东人民中具有崇高威望，“七七”这天，广州全市各重要地点都搭起妇女献金台计10余处。全市劳动妇女、职业妇女、家庭妇女络绎不绝，前来登台献金，热火朝天。宋先生偕我亲临各献金台，每到一处，宋先生就向献金的妇女群众挥手致意，而妇女群众跳跃欢呼，热烈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进入10月，天气渐寒，宋先生又召集广东各界妇女开会，商量发动为前方将士及后方难民征募寒衣的工作，提出“一个广东妇女捐制一件寒衣”的号召。宋先生以身作则首先捐制一批寒衣，全省妇女群起响应，争先恐后完成任务。10月10日，宋先生发表《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一文，勉励全国妇女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再接再厉，发挥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力量，打败敌人，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妇女的解放。

正当宋先生在广州期间，记得大约是1938年8月间，邓颖超来到广州。宋先生一向推重邓先生，这是宋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说过的。因此，要我以她的名义发起广东妇女界为邓颖超举行盛大欢迎会，我当即承担起这一任务。我先后走访广东国民党最高的几个领导人，余汉谋、吴铁城及曾养甫，他们一致表示全力支持，经由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机关派员协助筹组布置，决定在

最具规模的哥伦布大餐厅举行。这次盛大的欢迎会，以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为首的广东省及广州市各机关首长的夫人几乎全都到场，留在广州的共产党妇女工作者均被邀请到会。广东妇女界知名人士，如女专家、女学者、女社会活动家及各界妇女代表皆应邀参加，济济一堂，座无虚席。五四运动时期，同邓颖超发起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觉悟社、创办女星社及《妇女日报》。并同在达仁女校教书的李毅韬（峙山），和邓颖超在天津女师同学、觉悟社 10 个女社员之一的郑漱六都适在广州，这二人我都熟识，特亲自前往面谈邀请。会场庄严热烈，充满亲切、和谐、团结的气氛。开会时，首先由宋先生致欢迎词，她说，邓先生来广州是旧地重临，前次来是为了革命，这次来是为了抗战，把革命和抗战的关系作了阐发，最后她提议请到会的人全体鼓掌表示热烈欢迎。宋先生的欢迎词热情洋溢，博得掌声不绝。邓先生致答词，首先对宋先生和到会各位为她举行如此盛大的欢迎会表示谢意。然后就当时抗战的形势作了分析，指出抗战必胜的前景，希望到会者树起抗战必胜的信心，踊跃参加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到会的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大约同是当年 8 月间，世界青年大会在美国纽约举行，世界多数国家青年代表团前往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集中武汉出发，由前燕京大学教授张伯谨领队，其中广东省代表为岭南大学学生方鲁池。大会期间，宋先生在广州用英语向大会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呼吁各国青年站在正义的一边，阻止各自国家的政府不要同日本进行贸易，不要向日本输出军火及原料，要求出席大会的青年给中国抗战以支持和援助，保卫世界和平。宋先生的演说，得到大会强烈地反响。据张伯谨归来对我夫述及当时实况说："宋先生的广播震动了会场，征服了人心，发挥了威力。"

回忆当年宋先生在广州这一期间，我有幸得以侍从左右，亲承教诲，受益良多。宋先生的伟大人格和修养，使我感受很深。她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为继续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事业，几十

年如一日，奋斗不懈，堪称是一位有远大政治理想的杰出革命家。她为追求真理、正义、进步，立场坚定，百折不挠，永远保持着政治上的高风亮节。宋先生的性格，恬静而慈祥，热情而尊严；待人处世，和蔼可亲，是非分明，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一代楷模。

解放后，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与宋先生并未进行联系。直至她去世前夕，听说卧病，我出于极度怀念，才鼓起勇气给她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慰问。当时我还恐怕宋先生忘记我呢。当宋先生得知我在天津及我当时的一些情况后，立即指示天津对我做政治安排。

1981 年 5 月 29 日，宋先生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我禁不住涔涔泪下，当年一度在她身边工作的往事一幕幕地重现在眼前，今竟永诀，未能亲往向她的遗体告别，终生引为莫大遗憾。

追随吴菊芳从事战时妇女工作的七年

1937 年 11 月 12 日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进犯内陆，并窥伺南方沿海。广东海面日舰云集，广州局势顿趋紧张。国民党中央电邀宋庆龄赴重庆，宋先生未予置理，直至广州沦陷前几日，经广东当局敦促，始允去香港暂住。记得当时宋先生对广东当局在军事上的败退非常愤慨，给以无情的抨击。宋先生到香港后，一本初衷，要为抗战竭尽全部心血和精力，亲自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并积极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活动。这一段时间，宋先生以她在海外的崇高威望，在争取海外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起了重大的作用，作出卓越的贡献，永远载诸史册。

宋先生离开广州之前，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凤岐移居香港，委员兼总干事伍智梅则勾留在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迫于当时局势，并遵照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电示，经全体委员召开紧急会议，并承宋先生接受了要求，准我离开她的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